

钟敬文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南国已深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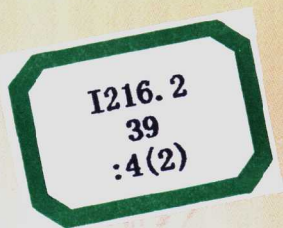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钟敬文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南国已深秋了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496



现代名家经典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南国已深秋/钟敬文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672-0/I·191

I 南… II 钟… III 散文-中国-现代 IV I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作者:钟敬文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672-0/I·191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二十世纪行将过去。当我们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回首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雨历程时,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文学“明星”仍然光辉灿烂,穿过历史的尘埃,照亮了“世纪末”的大地!

就像一位饱经苍桑的世故老人一样,“世纪末”的人们也普遍有一种“怀旧”心理,这或许是现代文学大师们的早期著作受宠的原因。本辑《现代名家经典》选取了林语堂、瞿秋白、冯雪峰、夏衍、庐隐、叶灵凤、谢冰莹、孙犁等八位作家的小说和散文等体裁的作品。小说作为作家反映生活的“晴雨表”,真实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而散文则来得更为直接,它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忠实记录,从中可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

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8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细读钟先生的散文是在认识钟先生很久以后的事情。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学专家，至今已逾 95 岁高龄了，但仍笔耕不辍，最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常人早已颐养天年的年纪，仍亲自带领数名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博士生导师。我于工作上的联系，常去探望钟先生，每次见他与自己的博士生们融洽地讨论问题，即使冬天，开着水仙花，堆满书的书房里也甚觉温暖。

以后，细读老人年青时的散文佳作，才深深感受到他那生于南国，而自然形成的恬淡温润的散文风格。钟先生的散文，或记人或咏物，文风皆宁静致远，或抒情或叙事，皆娓娓道来，不急不躁，读来感受到别一样的性灵之美。或许是生于水仙花、荔枝之乡的原因，天性中就蕴含着灵性；或又

是生于南国，少年正是多情时，又寄寓西子湖边的原因，笔下皆荡漾出无限温情与纯爱；又或许是“五四”的春雷，让他笔下有了忧伤之作；又或许是远去岛国求学的路上思乡、思国，笔下也荡起一阵阵惆怅的涟漪。

不过，钟先生自己最欣赏的是他抗战时期的散文作品。年青又多情时宜出纯情之作，而面临国难家仇时，作品中则似有枪炮之声，并饱含无限激情。

钟先生的散文大部分是解放前的作品，解放后则专注于民俗学的研究，至今已逾五十载春秋。无论是远赴日本求学，还是现在每日5时即起笔耕不止，都是致力于他年青时即选择的致学方向——民俗学。这个领域浩瀚无边，它通俗到摊上的小泥人，乡间的小工艺品，艰涩到日文民俗学理论，常人不易辨出其中况味，而老人却几十年来自得其乐。

我曾问老人何以早年专作散文，而后又专心学问，前后的界限分得如此清呢？钟先生淡淡地笑，他认为人年青时多情、多爱、多激情，所以散文、诗歌之作多些，而后年纪大了，沧桑多了，经历也多了，正该踏踏实实作一门学问，才不荒芜人生。

不过，由一个纯性灵之人转为闭门慎独的学者，这需要心境的转变，不知钟先生是怎样一下予坐住的呢？“天行健，人多自划于中途”，这是钟先生送给我的一句话，恐怕也是他年青时的感受吧。

那么现在让钟先生暂且放下他手中的书和放大镜，陪我们一起去品味一下他家乡的南国风情吧！

编选时曾得到韦韬同志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张 玲
一九九八年三月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张 玲
我与散文	1
水仙花	11
荔枝	14
再谈荔枝	18
残荷	21
花的故事	24
游山	27
多识草本	30
虫豸	35
南国已深秋了	41
咬槟榔的风俗	44
谈雨	48
黄叶小谈	51

忆社戏	55
莼菜	57
到烟霞洞去	62
九溪十八洞	69
重阳节游灵隐	76
泛月	81
太湖游记	86
羊城风景片题记	92
钱塘江的夜潮	97
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	102
雨讯	107
海滨	112
海行日述	115
金陵记游	137
西湖的雪景	151
莲花	158
阻雨	162
游龙井	168
茶	175
买红墨水之行	179
重游苏州	184
怀杭州	193
岁暮述怀	198
银盏坳	202
怀林和靖	209
黄肇望军长印象记	215
忆郁达夫先生	222
纪念托尔斯泰	231
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236

我与散文

近来有些地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发函给作家，询问他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年份写的，曾经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听说有些作家对此已经作了回答。我十分羡慕他们的好记性。就散文作品说吧，我便根本回答不了那些问题，尽管知道，能够真正回答出来，至少也是颇有趣味的事。

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散文并发表它的，我检查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从其中那些较早发表过的作品，看到所署时间为1924—1926年。这当然是可靠的。但是，在这些年份之前，我大概已经写过这类文章，不过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收进集子罢了。

“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耽爱了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就是所读的小说，也大都是文言的，如《聊斋志异》及那

些时候流行的《玉梨魂》之类。大约 1920 年前后,我转向了。我耽爱起新文学来。既然爱读那些新文学作品和理论,自然不免要学样写作起来。记得所写的有新诗、散文,甚至还学写过诗剧,那大约是受了郭沫若《女神》的影响吧。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又迷恋上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热心于搜集、记录歌谣、故事。

我初期写作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散文),有不少是发表在南洋一家报纸(《南洋日报》)的副刊上的。因为该报的总编辑是我的老师陈散尹先生。他可说是我新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恩师。他离开陆师后,到南洋去帮同乡办报,我们经常通音问。因此我那些时期的习作,就大都在他主编的报纸上与读者见面。

话有些扯远了。我写作和发表散文虽然开始于 20 年代前期,但是比较集中心力去从事的,却在 1928 年秋天,我从广州转到杭州教书之后的那段时间。1929—1930 年间,我印行了两本散文集——《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其实,那些时期,我还出版了一册谈论文艺的集子:《柳花集》。从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气息和风调看,也是絮语散文性的。记得阿英同志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就把它算作我的散文创作集之一。这可说是我散文写作的高峰时期,虽然它并不就是我这方面创作质量比较成熟的时期。

这些时期,我散文中所写过的、比较突出的对象是山水、草木等自然景物。我除了那时个人的思想等原因之外,客观环境是很有关系的。我正住在西子湖滨的杭州,而且有些时候简直就住到湖上去。自然,文集中还有写人物、评世相、谈文艺,以及直接抒写当时个人情怀的篇章。这些可说是《荔枝小品》内容的继续、扩大乃至至于深化(部分的)吧。

我那些散文,在风格上大都比较幽静、清淡。这种风格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荔枝小品》付印时期,朋友们的看法,和后来一些评论家的意见,大都认为是受了新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作家的影响,或者说属于他们的那个文派。这种意见我自己也是相当承认的。因为在那些时期,我的确诵读过周启明、叶绍钧、谢冰心以及俞平伯等人的文章或专集(如《自己的园地》、《剑鞘》等),有的还使我一时非常倾心。

但是,就在我初期的散文中,风格也不是很单纯的。它所受的同时代作者(包括年岁比我长的前辈)的影响也并不是单一的。稍微具体点说,在我当时的散文中,除了那些比较显眼的闲适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是批评性的、随感录(后来所谓“杂文”)式的。它更接近于时代的气息。而对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却是《语丝》里的另一类文章,另一些前辈。只是这类文章在我前期散文中并没有形成主要特色,因而被批评者所忽略了。

在我前期散文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内容到风格上都呈现着受过古典文学(特别是宋、明才子派的散文小品)熏陶的痕迹。这种痕迹,在《荔枝小品》中已经出现,到杭州时期的作品就更为显露了。

这种特点的形成,跟我当时的世界观和所写过的题材,当然都有相当关系;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文学上的爱好和修养。我从小就喜欢古代文学。《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等古典文学初级读本,不消说,早就念得烂熟了。我特别爱读苏东坡的小品文字,见了就不肯释手。他的那部明人编刊,近代翻印的《苏长公小品》,现在还经常放在我睡床前头的书柜上。我偶尔翻翻它,总觉得有些会心(当然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了),同时也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它对我早期散文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有关的旧事。当我第一次在中

山大学工作的时期(1927--1928年),正好顾颉刚先生从北京;上海等地为学校研究所购回一大批旧书。其中,《皇明十六家小品》一书,我看了非常喜欢。当时还曾经选录其中的一些作品做为中大预科的国文教材。这部书对我无疑也是有影响的。到了杭州以后,我又爱读张岱的《西湖梦录》、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四时幽赏录》等,这些也是不能不在我早期的散文上留下飞鸿的爪印的。

我前期散文,受了古典文学的影响,不但痕迹显然,而且所以造成影响的原因,也是蛛丝马迹,历历可寻的。可惜,过去批评我的散文的同志们,大都着重思想的检查(对作品内容情思正确的分析、评价,当然是必要的),却没有用多少心思去顾及其它方面的考察,所以把这种特点和它的形成原因都忽视了。这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成功的文艺批评家,比较丰富的学养、宽阔的视野和细心的观察能力,是何等重要!

社会不断变化着,人的思想和学艺也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30年代开始以后,我的学艺的方向,集中于民间文艺和民俗的搜集、研究,很少再写作那原来对之兴致勃勃的散文。这个过程仿佛是从高峰堕落到深谷的样子。自然,此后在阅读上和广义散文(如论文、序跋等)的写作的某些方面,我并没有和散文小品的格调完全断绝了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提起来就使人难过的事情。1936年夏,我在日本进修告一段落,将要回国之前,利用那段空隙时间,以散文札记的形式陆续写了一部稿子。目的是记录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以为这段住在国外生活的纪念。它虽然是带有文献性的,但是,无疑体现了我那时期对散文的看法和新的修养。可惜由于日本侵略军迫近杭州时,我带病离开那里,那册还未排成铅字的散文稿本,跟

其它的一些书籍,都在罪恶的炮火下同成为灰烬了。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损失!

战争改变了一切。像我这样一个长期蹲在书斋里的学徒也不能在炮声、轰炸声中安住下去了。抗战第二年七、八月间,我辞去江苏教育学院(它是从无锡迁到桂林的)的教职,从桂林到广东前线(第四战区)。不久,由广州迁居粤北。1940年春间,当地驻军击退了向北进犯的敌人,报上称为“粤北大捷”。战区军威民心为之一振。接着,我和杨晦、黄药眠等作家,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从化一带前线慰劳军民,并收集资料,拟写作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以鼓励军民抗战情绪。我分担写作的是散文报告。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行脚(前线交通工具困难,大部分的路程真是靠两条腿行走的),在秋天里,我们回到了曲江(当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我在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之余,陆续写成了几篇报告(《银盏坳》、《残破的东洞》及《抗日老英雄肖阿彬》等)。原想辑成个专集出版,可是战时印刷发行条件很困难,结果没有成功。这些战地报告,当时一部分被收入《良口之战》(曲江出版的战地报告文学集),其它,后来大都陆续发表在《文艺春秋》、《自由世界》等刊物上。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报告文学之笔。这在我学艺活动上是一个飞跃!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我的确是生疏的,尽管我曾经很认真地读过《秘密的中国》、《震撼世界的十天》等名著。但我当时写作这些报告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因此,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奋斗情形和人民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呢?跟这种后期散文比较起来,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从这点说,我的几篇报告散文,多少是值得自己珍惜的。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全国人民都希望从此能过上安定的日子。但是。国民党的好战派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悍然发起内战。次年,他们下了所谓“讨伐令”。从此,不但要在整个大陆上歼灭广大人民革命的军队和政权,连对于国民党区内的那些进步的人物和文化机关也要进行扫荡了。1947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当局接受了政府“乱命”,解除了我和其他几位进步教授的聘约。我于7月末,考完该校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毕业试之后,便化装逃往香港,接着在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

这时期,香港,这个中国南端的自由港,却成了由大陆移来的各民主党派总部和许多进步人士的聚集地和活动地。许多争民主、反内战的政治、文化集会不断在那里举行。进步的文化刊物也在书摊上出现了。它们有的是从国内移来的,如《群众周刊》、《文艺生活》等,也有的是在那里新创办的,如《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能仅仅做一个文学教师,同时必须做一个文化的、文艺的战士。我们大力从事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应用到南中国的特殊方言区(广东),从而教育、鼓舞更多人民为当时的解放战争而奋

力。此外,为了满足主客观的需要,我还写作一些文艺评论和散文。后者如《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人民的歌手》、《忆达夫先生》及《悼朱佩弦先生》等。这些散文,既是抒情的,也是意识到社会责任的。

这个时期我所写的散文数量并不多。从思想内容看,基本上是抗日时期报告散文的继续和延伸。在文章风格上,也跟那些报告相似,一般比较谨严、精炼。它大大矫正了我早期散文那些散漫、粗糙的毛病。这种风格大体上延续到解放后的写作中。

像上文所说,我过去所写的散文,有前后期之分。1930年,大约可以说是一个界石。后期的散文,变化是相当大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当然是个人生活实践和世界观的变化。中日战争,是民族的大劫难,是一座火的地狱。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我的思想、世界观,主要就是从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机会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是密切相联的)。作为逃亡者寄居香港时,是这种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这些变动使我后期散文有了新面貌和新精神是不用说的。但是,这不能说是那原因的全部。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它不是主要的一面。

1930年以后,我除了把大部分的精力集注于学术的研究之外,也不断诵读着国内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像罗曼·罗兰、法朗士等的散文,我是反复诵读、细细品味过来的。特别是罗兰,他的思想和艺术,在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成了我精神的血肉。其他欧美和日本散文名家的作品,我也曾耽读过不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生涯道路是相当坎坷的。我是一个喜欢蓄积书籍而又无力保卫住它的人。藏书失了又补,补了又失,这样已经好几次。有许多心

爱的书,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所幸在那些仅存的旧书里,还保存着《易匹鸠尔之园》、《超越混战》、《斗争十五年》、《亨利·来克拉夫的手记》,以及《做梦的人》等残旧的书册。它们曾经是我心灵的伙伴,现在也还不失其为老朋友。我要卫护它们,一直到我生命存在的最后时刻。

对于那些名家的作品,我虽然那么耽爱,却没有存心去模仿它们。因为我知道这模仿的结果将是什么。可是,长久耳濡目染,自然使我自己的写作变了样,在风貌上它不可能不起变化。这就是我的散文(尤其是它的风格)在前后期有着相当不同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

华北解放了,我从香港来到北京。接着全国也解放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作为一个新社会的文化工作者,我正以无比欢快的心情,忙于新的教学工作,忙于新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散文写作一般不免疏远了。但也有那种偶然的机,如1953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为了纪念五四运动45周年索稿,我就写了那篇《一阵春雷》的稿子。

1956年夏,全国文联组织了作家西北地区参观团,我和冯至、朱光潜、常任侠等同志都参加了。我决心在学习、考察的同时,收集资料,回京后写一本散文游记集。8月末回到北京,曾经小住西山碧云寺(当时是文联的休养所)。在那里,我吟咏所收资料和见闻回忆,开始了我的散文写作。已经写出了《玉门之夜》、《访问韩起祥》等底稿。但是,那时学校工作忙,我除了教学外又兼了些行政职务,只得于10月间匆匆回城了。计划中的西北散记,始终没有续写,连那已经写出的一些底稿,也没有整理出来。倒是那回山居时的副产品《碧云寺的秋色》、《夜游卢沟桥》等,不但早已在报上发表,有的直到近年来还被选入散文集子在重新流传着。